

戈尔巴乔夫现象

〔美〕摩西·莱文

李宝鸿 姚昌忠 秦 牧 等译

求实出版社

DG87/04

76140

戈尔巴乔夫现象

〔美〕摩西·莱文著

李宝鸿 姚昌忠 秦牧 译

求实出版社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88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译出

戈 尔 巴 乔 夫 现 象

Gerbaqiaofu Xianxiang

〔美〕摩西·莱文 著

李宝鸿 姚昌忠 秦牧 译

李宝鸿 校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625印张 10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ISBN7-80033-173-3/D·65

定价：2.00元

序

本书完稿于1987年2月。当然，苏联发生的事情是陆续展现出来的，1987年初不过是初见端倪的现象，如今已是世界各国报纸经常报道的新闻。

历史学家当然不应追逐于每日发生的大事之后，那是新闻记者和评论家的活动范围。然而，时事却也不必成为学者不得涉足的禁地。本书采用了一种可称之为“当前的历史”的观点，不是把史实和事件加以堆砌——那就写成历史了——而是把各种事件从属于某一过程，就是以具有某种倾向、通过若干阶段、并跨过若干关口的连续性来观察。

具体地说，这个历史阶段观点是作者立论和评价的基点。作者总是力图把当前发生的事件放到俄国和苏联社会历史的长过程中加以观察。从俄国和苏联的社会阶级、人口统计、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研究可知，每当社会制度的参数发生了变化，这个国家就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面貌不可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等地反映出来。如果制度的某些方面严重落后，例如政治体制僵化不前，就会引起危机和动乱。其结果若非更加恶化，势必要实行改革，或者就陷于停滞。这就是20世纪的苏联所处的状况。

然而，许多西方分析家却只见苏联的停滞和衰退，而不见苏联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如城市化、工业化、专业知识

分子阶级的成长等)。这种错误倾向使得他们把非常复杂的事看得过于简单，也就不能正确解释近半个世纪以来苏联所发生的急剧变化。比如，西方把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柯西金所作的改革一笔勾销，认为那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改革愿望的又一次冲动而已，苏维埃制度仍将依然如故。

可是，实际生活中绝无全然不变的事。对于探索苏联历史进程之动力的观察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改革及其明显的失败恰恰是一个新事物行将来临的信号。正如我在《苏联经济争论中的政治暗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者》一书中所说的，这些事件证实了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时代。正在出现中的“文明社会复苏”现象预示了苏联国家统制经济的软化。这是一种终将引起整个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调节。这个国家不良的经济实况和积习难返的低效率，对社会和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可是，改变经济模式的努力却遭到政治模式的阻挠，而这种政治模式已不能使这个国家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社会制度的基本领域中被忽视和被误解的内部关系，比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已成为苏联所遭遇的难题之中心。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苏联的政治家和改革者们刚刚开始，而且是非常胆怯地着手去分析这些问题。那时，对于未来的改革者们来说，认清将要采取的政策规模和复杂性的条件尚未成熟。经济仍被看成是唯一的独立领域。人们，尤其是政界精英，对苏联的社会结构所知甚少，对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和相关性也知之甚少。这个国家的精英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知识方面都尚未成熟到能够作出相当全面的分析和设计必要的大规模改革的程度。

但是，今天的苏联领导层既了解时代的呼声，也具备政治勇气和充分的知识，足以完成把它的制度导向大约从25年到30年前就已开始的历史时代过渡的极其复杂的任务。戈尔巴乔夫的形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愿意公开承认苏联积病之深重，而且认识到必须对制度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同时实行改革。他懂得仅仅抓住经济这一局部远不足以推动全局。为了适应当前历史阶段的结构性的要求，社会、文化、国家、党和经济，各方面都应协调步伐，一致行动。

在这些日子里，对待苏联国内外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戈尔巴乔夫显得非常认真，他的政府也不像快要垮台的样子。苏联领导人所谓的“新战略方针”在1987年里变得更加强化。他们差不多是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更好地谋划出改革应涉及的范围。然而，当他们的认识和论证变得更加复杂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也加重了，而且看来似乎难以完成。虽然如此，他们视野的开拓却使得整个改革事业变得更加现实可靠。

须知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改革时代的开端而已。至少还得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它的面貌才能充分展现。目前在苏联酝酿中的变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富魅力的现象。迄今已宣布了许多，说了许多，也做了许多。称之为戈尔巴乔夫政策已经不够了，把它称为“戈尔巴乔夫现象”更为恰当，即使目前我们还不能阐明其全部重要意义和它的去向。

目前，专家们确不应勉强就此类问题作出解释。即使提出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强度、持续性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尚属为时过早。为此，我们应首先了解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已经

发生了的变化。所以作者虽然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改革运动的某些潜在因素，却以更多的篇幅着力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带来了一个新的苏联社会性现实的那些变化。这个新的社会环境反过来又产生出一大堆难题，带来了要求解决这些难题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并造就了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的准备提出必要的解决办法的一批人。

最后必须提出，现在，公开性这个口号几乎已传遍全球，这个口号的推行也许已经渐渐形成一种虚假的透明度。须知我们对苏联的了解是不足的，而正在出现的情况的复杂性，也不是用一两个口号就能够概括得了的。由于公开性的继续推行，使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陌生的方面。诸如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勤奋与懒散之间的紧张关系、改革的赞同者与反对者的不同要求，等等。现在的苏联确已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表现得铁板一块与协调一致了。

这个新情况使得大多数苏联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众都感到困惑不解。苏联改革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分成了中立的、顺从的或担心的群体，他们对新的领导有的持支持态度，有的持反对态度，有的甚至主动发起攻击。不少同情者忧心忡忡，许多改革的反对者主张把刚刚给出的自由收回。人们预言改革会出现倒退、“肮脏的妥协”、甚至公开的出卖。另外一些人争辩说改革正在受到欢迎，公众正在积极响应改革。无论最后结果如何，看来至少要经过10年，从这些力量和观念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当中，苏联才能出现新的政治局面。无人能预见苏联的未来。旧制度仍然存在，它的支持者为改革所困扰，必然抗拒改革。改革者尚无必胜的把握，

他们还得为此努力奋斗，还得采取新的果断行动。他们倘若失败，必使苏联损失惨重，并且一定会对全世界产生消极影响。现在，全世界都有充分的理由密切注视着莫斯科。

谨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编辑组致谢。他们给作者提供了许多方便。希拉·莱文在我筹划别事时促我写成此书。玛丽·兰普雷克和莉莲·罗比恩提供了全部报刊资料。艾米·艾因索恩为将初稿编成定稿出力良多。至于本书的观点与其中的谬误自当由我个人负责。

1987年8月

DG87/04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部分 从乡村到都市

——一个仓促建成的国家

第一章 农村方面，从沙皇到斯大林.....	(9)
第二章 城市的兴起.....	(23)
第三章 城市社会，新的劳动力结构.....	(33)
第四章 知识分子.....	(44)
第五章 城市微观世界及其力量.....	(49)
第六章 舆论的支持.....	(56)

第二部分 新 进 程

第七章 社会科学：新意识形态.....	(65)
第八章 “计划失衡”，危机的形成.....	(79)
第九章 出路：新方针.....	(88)
第十章 戈尔巴乔夫的挑战.....	(96)
第十一章 政治纲领：一党民主吗？.....	(102)
第十二章 经济困难：计划与市场.....	(108)
结束语.....	(115)
书目.....	(122)

绪 论

苏联也许正处于国务处理方式、甚至国家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关头。自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担任总书记之后，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越来越耸人听闻。西方观察家们虽然承认情况相当不坏，但是，他们若非狐疑重重，也是困惑不解。因为许多人，其中美国专家的影响最大，根本不相信苏联会发生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或政治性的变化。他们预期戈尔巴乔夫继续搞些小修小补，但却预言对于一个已经试尽一切可能的制度来说，只有长时期的停滞。

然而要批驳这个普遍的看法也并不容易。50年代，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发动的惊人的非斯大林化受挫，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有所倒退。涌起了各式各样的希望，而后又归于破灭。60年代，由阿列克谢·柯西金推行的一大批经济改革，也未能使停滞不前的经济体制发生多大的变化。文化生活方面，“解冻”总是随之以“封冻”。那么，人们又何必比上一次更加认真地看待最近的一次“解冻”呢？

然而，这一回怀疑者和反对者可能把某些极其重要的东西给忽视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固然受挫了，但并没有发生再斯大林化。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但留下了仍在进行中的经济试验，留下了一种驳不倒的“社会主义市场”概念、一门以数学为特色的有效验的经济科学、和一批只要形

势许可就准备再来大干一番的新的学者、学术团体和专家。文学艺术界甚至无需官方的新的解冻就在继续进行庄重而多样的活动，占领着新的阵地——官方的、半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深刻地改变着文化界，并至少正在获得事实上的承认。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并已蔓延到包括公务员界在内的不同的公众中去。可是，西方对苏联的了解却极其闭塞，以至于以为苏联的生活当中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就别无其它了。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种种变化已在表明深层有些事情正在酝酿之中。英国新闻工作者马丁·沃克在他最近的一本很具暴露性的书中涉及到这个有关的大问题。他写道，“在勃列日涅夫的酣睡中，这个国家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108：75]。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那时许许多多的观察家必定在和勃列日涅夫一起打瞌睡了。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教授在最近一次谈话中抱怨说，“对于戈尔巴乔夫，苏联问题研究界的同行们那时还来不及研究。”

让我在此根据我以前写的几本书里的论点，概述造成这种状况的某些原因[62：4—5]。

牢牢笼罩着苏联问题研究界的流行概念是“极权主义”。这是指一个恐怖主义的政府，通过大规模思想灌输、警察和意识形态洗脑筋、垄断消息源以及对经济行使权力并直接控制，以谋求对全体居民的全面控制。按照这个模式，国家运用它的力量排除文化界或其它领域的组织上和表现上的任何独立自主倾向（得到批准的除外）。这个“极权主义”标签曾被用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之类政权。这个词也确曾用于某种认识方面的目的。但如众所

周知，这个词在冷战的战略对抗当中又被西方出于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借用。于是这个词本身带有的使人憎恶的感觉就从原来的敌人——纳粹德国——转向新的敌人苏俄。与此同时，那些有影响的苏联问题研究者对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并非毫无所知，他们想使极权主义这个词看起来像一个解释的理论性概念，以便公众和研究人员在理解这种制度时有一个工具。

这个词虽然在意识形态的功能方面甚为贴切，可是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却毫无用处。它没有说明这个制度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如果有变化，它正发生着那样性质的变化，又该怎样进行批判性的和认真的研究。关于这点，这个词的空疏虚骄正说明它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因为它对苏联的任何变化机制视而不见，而且，即使是某些历史性过程的前兆也无法用它来解释。

总之，西方对苏联及其前景的看法受到一种认知图式的严重干扰，使得专家们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看世界。60年代里，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终于放弃了这个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工具。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探讨，从而充实了我们的了解。然而，总的说来，这些分析都含有“极权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设想，注意力仍然停留在国家和国有经济的研究上，而把苏联经验的许多其它方面排除在外。

对苏联国家的研究当然要做。但是必须看到，30年代里五年计划的推行和斯大林主义的形成，的确使得国家的作用突出了起来，从而使得许多观察家自然而然地把国家看成是政治制度历史中若非唯一的也是主要的因素。一党统治的政权、

国有经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和警察控制、生活当中全面的官僚主义化、有权力的领导层，以及在一段严酷的时期里拥有无限权威的专制统治者。这些都是事实。也许就是这些使得人们以为研究这些要素就抓住了整个问题的关键。这个看法似乎已被证实，于是他们就得出概念残缺的结论和一个谬误不全的图象。以下就是这个非历史的看法：一个没有社会制度的政治制度，一个内容包罗一切的、甚至包含其自身历史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只遵从它自己的规律，而且这些规律只可用它自己的词句来解释。想要弄清这些“规律”究竟是怎样，却不能超越不变性、停滞性或固定性的法则。倘若假定变化是可能的，就把它设想为不变框架中的微小变动；那么，在这样的国家实行认真的改革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了。

他们的注意力专注于此，大多数分析家全然忽视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性现实当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成分。对丰富多彩而且错综复杂的苏联社会结构的研究很少；那些形成观念、态度和愿望的苏联的文化、对立文化和副文化也都被严重忽略。社会、文化与经济、国家、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从未被探索过。然而，严格地说，如果我们想对历史事件真正有所见地，这些概念是必须研究清楚的。

总之，逐渐被忽略的是苏联“社会制度”的概念，是动态历史过程的概念化。在动态历史过程中，各个子系统在时空中互相作用，产生出更为错综复杂的模式。

因为苏联的社会尚未被专家们从它的各个方面的现象进行研究，于是他们对苏联的历史经验仍然知之甚少。在西方思想对苏联的看法还没有打开视野之前，仍会经常作出代价高昂的判断错误，危机会被过分渲染，或者在危急关头才被

看了出来，而对力量与活力的泉源仍将视若无睹。究竟还得多久，西方的学者、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才能端出“他们的”尽可能简化的俄国观呢？

有些基本的而且可望有用的概念，在现阶段提出来还不致于超越任何一个伟大的理论。不论人们如何界定一个社会制度——这个题目已有大量的文献——人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以为社会大概是力量虚弱的、不起作用的，因为它要么是“原子化的”——如许多人关于苏联、尤其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争论——要么如同保罗·米柳科夫在讨论沙俄社会时主张的那样，由于大量的社会差别，仅仅是松散的结合。

虽然这些词在特定情况下显然可用，但是，有时这样描述的社会给人以具有活力和内聚力的印象而与词的本意不符。因此，这些概念对我们没多大用处。社会差别、社会冲突和社会分歧、妨碍不了一个社会制度作为一个集合体形成起来，并对它的各个部分施加影响。贵族的巨宅和农民的小屋、资本的闪烁光华和贫民窟里的凄惨穷困、饱学之士和文盲、有权有势者和孤弱无依者，汇聚到一起组成一个制度。政治事件和经济、公路和铁路、学校和教堂、收税者和军队、拿薪金的和给人效劳的，都是那强大的、常常未被认识的构成历史性实体的链节。这些链节，即使是松散的叠盖结构，仍然是个互为联系的制度。对社会制度若无这样的理解，人们就只能把制度和结构的危机和革命性的变革全都解释成由于某个国王、某个女王或某个蠢汉的昏聩引起的偶然事件。

国家不论怎么专制，总是历史性实体中的一部分。它拥

有权力，但却受各种压力制约，也受由于外界的独立因素或国家自身的行为而引起的破坏性影响的支配。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会产生很快的、而且常是未曾料到的影响。比如统治集团失去了活力，耗竭元气的经济危机，以及在全体居民或举足轻重的精英人物中失去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民主制还是独裁制的国家必陷入困境，因此必须改弦易辙，不然就是灭亡。

正是上面所说的那些情况都发生在苏联的历史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这样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摆弄得晕头转向，显得难以支撑，也在不断地规定国家的领导层应予承认的对国家机器的限制和约束。一个政权如果不能遵守这类限制，领导层自身将为此付出代价，或者使国家遭受政权丧失威信、腐化、削弱的沉重损失。

这样的研究方法更困难但更见效，使得我们能够掌握发展的主流。这个主流几乎常常使得一个制度走向国家领导人原先本不想去的方向。规划者毕竟不会去规划困难、失调和危机，可是他们得到的常常却是这些。

还有最后一个概念性的观点。当人们想要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常见的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一个国家，不论怎么专制，总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不会总是维持专制而避开悲惨的结局。如果人们接受这个论点，那么就非得用这样的国家观才能抓住政治和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

国家是一系列强制性和综合性职能的载体，它依时空而变化，而且由一批可称之为“政府”的机构执行其职能。这些机构又从那些并非政府组成部分的别的机构得到帮助；例

如，提供领导人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政党，和政府关系密切的私营武器生产厂家。于是“国家”就是一个包含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内的子系统。

接着就是为数众多的各种机构。它们既不是政府的，也不是国家的。可是倘若没有它们，社会职能和国家的合法性就不完善或者落空。这些机构就是工会、教会、宣传媒介以及其它愿意支持那个制度的各种组织。这些集团和国家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实体，即政治体制。正是在政治体制上，国家和各种社会因素的联系建立了起来，或加以修补，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一个三阶概念的阶梯——政府、国家和政治体制——使得我们可以对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论证：一个弱的国家却无妨于一个坚强的政治体制；或者一个显然脆弱、得不到支持甚至骚乱不宁的政治体制却得到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支撑；或一个贫弱的政府，即使不能维持下去，也可以从一个强大的国家或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得到帮助。

在我们的讨论中引进了社会性因素和社会因素，使得我们看到，苏联的历史和国家机构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具适应性和对社会现实的敏感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着手考察苏联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制度的过渡阶段和当前形势的性质。对于苏联历史中长期争论不休的斯大林主义问题的分析和解释，也可因此变得较为经得起检验。

总而言之，苏联非常复杂非常丰富多样，对于研究者是个更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它总是藏而不露，总是捉弄那些粗心轻信的人。分析问题的时候，只是局限于运用简单化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概念，就使得知识界和政界人士屡犯错误。如果把学者、宣传媒介和政治家在苏联历史的

各个重大转折关头所作的主要论断和预测，汇集起来开列一张清单，那么正确的决不占多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但希特勒，还有西方国家领导人和军界人士都曾断言苏联很快崩溃。斯大林去世之后，许多人又预期将会出现另一个斯大林。至于苏联的制度是否不能以别的方式运作的问题更是争论不休。从那以后，人们反复不断地听到苏联政府不稳的说法，说是每次更换总书记的时候苏联政府都摇摇欲坠；说苏联不能处理接班问题（这个说法确是前后三位新总书记接任时新闻报道的基调，但每次不过喧嚣几天而已）。

但是与广为流行的错觉相比，上述许多错误的说法实在不足挂齿。这个错觉认为，由几乎僵化的体制性网状组织产生的苏联的一个特有的弱点，使得它只能总是那个样子不可变易，最终注定失败。

但是，我们还是从以下的设想出发为好：苏联的历史过程曾经并将继续充满迂回曲折以及形式和内容的变化。这样，我们就会懂得，远不是什么“完蛋”，俄国如今正进入一个关键性的新阶段。因此，它在许多方面正是个开创者。